社员都是向阳花

——执导话剧《日出而作》有感

查丽芳

“公社是颗红太阳,社员都是向阳花。花儿朝阳开,花朵磨盘大。不管风吹和雨打,我们永远不离开她……”这首歌当年的知名度极高,流行度极广。社员唱、工人唱、学生唱,风行全国。歌词像打油诗,小调式的旋律倒也朗朗上口,一唱就会。人们勒紧裤腰带忍住饥饿唱着丰收的喜悦。一唱就唱了整整十几年。

读《日出而作》猛然想起《向阳花》,那旋律竟然固执地萦回在耳际久久挥之不去,忆着哼着涌出莫名的激动,心中五味俱呈。当然免不了对当年的自己来一番自嘲。

那年月多数人都做着白日梦。

那年月多数人相信“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桥梁”的口号。80后的后生会笑我们傻冒儿。的确。天堂虽然云蒸霞蔚直冲云霄、美妙无比,但桥梁的桥墩它怎么也无法架在虚渺的天上。

《日出而作》的剧作者刘锦云说:“这个本儿是我对过去那段岁月的一个凭吊,一个回味,一个反刍。起一个‘温故知新’或是‘忆苦思甜’或‘忆苦思前’的作用。”剧作家从苦与甜、苦与前、故与新这两种情感立场出发,动情地描绘着当年他所熟悉的河北农村的人与事,在凭吊、回味、反刍中梳理出对农村改革30年伟大成果的由衷赞扬。

《日出而作》分三幕。写上个世纪太行山足下一个生产队的一天:上午、下午、晚上。故事以“三一律”的形式,按时间顺序展开。作者把生产队的各种人物聚集在生产队队部兼牲口棚里,目的不是挖掘其中一个或两个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形象,而是“人像展览式”的让观众观赏当年农村最基层行政单位——生产队的一群普通农民的生存状况和心之向往。他们是:爱社如家的陈老炳,爱庄稼如命的“坏分子”赵有常,有搞经济流通本领的“投机倒把分子”崔长利,下山找男人的单干户金大翠,德高望重的老烈属土改妈朱大娘,被生活拖累得疲惫不堪的杜二嫂,有娶了富农子女的城里人马克平,有被阶级路线边缘化但骨子里有股狠劲儿的周祥善,有我当年的同龄人死了的和活着的小梦姑娘……众多的人物和众多的事件在营造戏剧情境高手的刘锦云笔下,人物以或并列或交错的运动态势呈现出当年河北农村生活的原生态。人物各自的风风雨雨、悲悲喜喜的人生遭际,以及其中社会因素的心理含量常常打动我、震撼我。从清晨到午夜的一天之间汇聚而成的生活断面让我体味出当年农村真正的精神底蕴。剧本一方面揭示当年农民生活的艰辛,一方面歌颂农民的勤劳善良。古人所谓:“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金圣叹《水浒传序三》),剧本在这方面下足了功夫。作者熟练地操作着他那经过提炼的河北方言,亲切地描绘河北乡村的历史风貌和人文风貌。写赵有常对庄稼的深情台词尤如带着泥土芳香的诗;写陈老炳的志趣情调,台词则俗中寓雅、雅中若俗;写行走于江湖的配种员焦师傅与劁猪的吴师傅,台词幽默诙谐、俗笔出之;写金大翠追求陈老炳的台词则干脆利落掷地有声、亦雅亦俗……几副笔墨的灵活变换,形成了《日出而作》在文学语言上的美学追求。这种在语言上的乡土气与书卷气的互相渗透使人物细腻逼真、自然传神。让我自然地在往事如烟和往事并不如烟之间行走,剧中的场景渐至清晰至呼之欲出。

《日出而作》绝不把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者奉行的“三一律”,即情节必须在一日、一地、一事的规定奉为神明。《日出而作》不是一事,而是多事、事多。生产队的芸芸众生均有各自的历史轨迹和现实境遇,都有各自的外在环境和内心生活。悬念也各有所指,即使是张罗选队长这一事件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终究没有选成队长。全剧妙在所有剧中人的行动都归纳在一条主题轨道上:无声的道出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广大农民渴望期盼改革的心声,折射出农村改革的必然性和迫切性。

第一幕开头就很独特。寡妇金大翠钻进了光棍汉陈老炳的被窝。这对人物的政治身份:男的是五好社员,女的是单干户。光棍儿汉看不上单干户,寡妇偏偏一厢情愿喜欢上了不解风情的五好社员。外乡人金大翠的到来引发了社员们对“日出而作”生活、生产方式的追忆、羡慕、向往。作者看似在写光棍儿汉与寡妇的恋情,但笔触却穿越男女情爱而抵达主题,剧尾当陈老炳怀抱“五好社员”奖状挥泪告别生产队,决心弃社单干,正是一个忠厚农民对自身命运的一次主动选择。其人物命运与时代精神如盐之入水般了无痕迹地融为戏剧情景之中。

接着数名社员登场选队长。选谁不好,偏偏要选“坏分子”赵有常。原来,生产队轮流坐庄人人都当过队长了,但谁也没把生产队搞好。说白了,生产队这种形式本身就违背了农业生产的规律,没法弄得好。陈老炳暗中推荐了赵有常,指望这爱庄稼的“坏分子”给生产队带来点希望。可赵有常懂得人要有尊严,死活不肯学那三声驴叫,宁可再带着他的“坏分子”的帽子也不当队长。没有队长的生产队很热闹:敲锣打鼓挣工分、甩百分、继续等着选队长。全剧写赵有常就三个场面:治保主任找赵有常做工作,要他认错摘帽当队长;赵有常发现庄稼地里的粘虫,为此他又干了件“坏事”;赵有常为了治粘虫当了队长,刚上任就被公社干部抓走。这个地道的庄稼汉优秀、硬朗,应当是袁隆平的爱将。舞台上发生的这些事件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复杂,深刻的和浅薄的、伟大的和渺小的、悲苦的和滑稽的同时并存此消彼长。

第二幕,所有的人物在幕间经历了一次精神、情感以及心理的重创。暗场戏,嫁给城里人马克平的妻子富农子女小梦难产死亡、儿子无恙。事件虽然没有直接出现在舞台上,却是剧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明场戏,马克平和小梦的初恋情人地主儿子周祥善的精彩对话。两个男人共同埋葬一个女人,爱情的分量、婚姻的质量在强烈的心理冲突中撞击出来的真情火花为这全剧开始抹上一层冷峻的色调。悲剧性的“蓄势”后,私下认了小梦为干女儿的陈老炳情感浸泡的“送小梦”,是那年月珍贵的乡村真情的深沉咏叹。

悲剧性的事件接踵而至,秀美好学的大队广播员杜社花“自愿”被贫困逼得无奈的母亲杜二嫂,以“交易”的方式与老烈属朱大娘的儿子土改订了亲。重男轻女的杜二嫂用闺女为儿子换回了一纸招工指标,杜二嫂庆幸。朱大娘为30岁还尿炕的儿子换来媳妇,朱大娘负疚。暗恋周祥善的杜社花永受精神与感情撕裂的双重痛苦。杜社花是活着的小梦。

死去的小梦与活着的小梦是紧密相嵌的两个板块,其意蕴贯通。

围绕“小梦之死”,作者的悲剧性布局相当智慧。马克平为亡妻土葬改火葬接着是闪电式相亲、登记结婚、丧事喜事一起办。终于激起众怒,乡亲们为小梦叫冤,为周祥善鸣不平。悲剧的最终指向不只是怜悯,而是超越怜悯,直逼小梦死亡的人为根源。

第二幕不只有悲剧。优秀的剧作家懂得“要想甜放点盐”的道理。配种员焦师傅、劁猪的吴师傅很有乡村喜剧感,尤其是这对绝配的职业感地将动物的繁衍与人物命运无意暗合所产生的诙谐也会让你轻松一笑。值得一提的是一个有关主题意义的小人物在这幕的登场。他就是“投机倒把分子”崔长利,这位搞活经济的先知先觉者秉承父亲看皮货的本领主动将自己推入经济流通的暗道。被“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干部差点抓了个现行。舞台上玩起了猫抓老鼠的游戏。乡亲们不但不恨这只“老鼠”,反而对他高看一眼,主动配合打掩护。既是乡亲们的善良,也是物质贫乏的乡村有着商品流通的真切需要。这场掩护战中可以感受到上世纪70年代中国农村那扑面而来的时代气息和人文精神。这种时代气息和人文精神更为突出地体现在女主人公金大翠身上。这个日出而作的山野之女虽然在命运之途上跌跌撞撞,仍然勇敢大胆追求爱情,毫无禁忌。得知单干户的政治身份成为爱情障碍时也含泪控诉资本主义。一但看清生产队的真实情况便一路腾跃将爱情进行到底。金大翠,这个有着旺盛生命力的女人在无形中在社员们心中树立了一个坐标。这坐标注定会长久地在生产队扎下根。

古人总结写文章要凤头、猪肚、豹尾。剧本创作一样。《日出而作》三幕正是凤头、猪肚、豹尾。

豹尾,指收刹的戏要有力度。

第三幕。折腾了一天的选队长,赵有常、崔长利走马上任,为灭粘虫赵有常叫了三声:“饿”。仅当驴叫后立马排兵布阵消灭害虫,社员们为填饱肚子热情高涨,决心挑灯夜战,就在全体人民情绪激荡的那一刻,一个干部突然闯进了会场,当场抓走了赵有常、崔长利,最讲阶级斗争的治保主任当场撤职写检查……一场还未展开的灭害虫运动戛然而止……绝望中的五好社员陈老炳终于与单干户金大翠共赴深山单干。这一走走出了感情、走出了主题、走出了70年代中国农民的真实愿望。

读罢剧本,“社员都是向阳花”的旋律渐行渐远、小岗村村民冒死按下分田到户的鲜红手指印清晰地映在脑海。青山碧水间跳跃闪动着的那个最有活力的单干户女人金大翠站在我的眼前,她笑了,笑得很脆很甜。陈老炳这位底层农民质朴而又复杂的生命感受突然撼动了罗中立的油画“父亲”手中的碗……

在河北省话剧院的恳切催促下,我以为自己做好了功课,可以走进剧院。

喝着小米粥、吭哧一口咬住香喷喷的驴肉火烧,我知道我真的到了美丽的石家庄……闻到只有舞台才有的那种味儿,我知道《日出而作》将会紧锣密鼓地奔腾起来,我也知道要走的路会很长很长……

刘锦云的农村情结

——兼谈话剧《日出而作》

王育生

说来也巧,我和剧作家刘锦云同窗(相差两年先后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同庚(1938年生人,均属虎),且同乡(锦云籍贯河北省雄县,我祖籍河北省定州)。朋友熟人之间,能具此“三同”者,甚为罕见。

据我观察,北大毕业的人性偏走单而不喜抱团,平素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彼此间甚少交往拉扯。在校学习的时候我和锦云只远远地瞄过,知道对方的存在,却从未言谈。反倒是参加工作之后,因为都在北京,且同在戏剧圈里谋生,我又在媒体当编辑记者,必有交往,这才逐渐熟识起来。

刘锦云天资聪慧,为人睿智,博闻强记,且勤勉过人,踏上文学创作之路后,很快就在业内做出了骄人的成绩。

锦云文学之路的发轫之作,是在《北京文学》上发表的小说《笨人王老大》(与人合作)。以一部农村题材的处女作,就能叩开文学刊物的大门,在其上嵌入自己的手模足印,此事对锦云来说既属难得,其实又很正常。

农村题材的文艺创作,在我国历来属于“珍稀品种”,由于该领域屡遭灾变,生态状况堪忧,一直较为缺少名家名作。若是细分析起来,会涉及到社会经济文化诸多因素,本文不想就此多所涉足,只是在论及农村题材创作时不能不提到这种状况。既然稀缺,就必显金贵。改革开放初期,像刘锦云这么熟悉农村生活,笔下富含乡土味道,又有思想深度的作家和作品,实属凤毛麟角。

刘锦云出身农家,进京上学前有着10多年在河北乡间生活的经历。家乡的土,家乡的天,乃至孩提时代趴在村口土戏台前所看到的那几十出梆子戏、蹦蹦戏,对他来讲都已浸入骨髓,化作了他刻骨铭心的童年记忆,濡为他的人生底色。对农村生活、人物、风土、人情稔熟,同时又具有较高学养和文字功底,从事起文学创作来自然是厚积薄发、水到渠成。正唯如此,他才能在这个领域里出手不凡,并一直保持着作品高成功率的特点。

不能不提到的另一件事就是,刘锦云1963年大学毕业后长期在京郊昌平农村工作,为时16载,相当于两个抗日战争的长度。其中有8年是在公社里任职,终日摸爬滚打在生产队的田间地头,行走于大队部、饲养室、茅屋草舍之间,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管新旧老幼,能有他这份“行状”者,怕是不多。在京郊的长期经历,叠加上他的童年记忆,无疑更增厚了他的农村阅历和生活积累,并触发了锦云对他所关切的中国农村问题,以及农民命运,进行深入的思索。

1982年刘锦云进入北京人艺成为专业作家后,1984年就拿出了《女儿行》(与人合作)。此戏格调清新,感情浓烈,语言生动,演出很成功,在舆论界获得了普遍好评。但这个作品对展现锦云所拥有的创作功力和才华而言,还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初试锋芒而已。直到1986年他创作的《狗儿爷涅槃》面世,才真可谓横空出世、一炮打响,给广大观众带来巨大惊喜,也令剧坛为之一振。

《狗儿爷涅槃》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最为突出的是它成功地塑造了狗儿爷这个北方农民的典型形象。围绕着土地的失而复得,作品生动而深刻地表现了中国农民与土地生死相依的关系,描绘了狗儿爷一生大起大落、悲喜交加的命运。这个人物保守狡黠,一身的毛病,但作为文学典型,他却鲜活生动、有血有肉有呼吸,是个非常可亲可爱的活人。曾有论者将其和阿Q相提并论。《狗儿爷涅槃》题材独特,视角独特,展现的方式和手法,乃至戏剧结构、台词、舞台空灵的面貌,都是全新而独特的,既具有舞台艺术的魅力,又富含诗意和哲理。因此自该剧上演以来一直好评如潮,被誉为“时代的杰作”。

在此我不想对《狗儿爷涅槃》展开来分析,而是只想说明刘锦云的创作,是深深植根在农村生活的土壤里的,是源自于他自己的心灵之泉的。用刘锦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的题材、素材,即我要写的东西,都是“不期然而然的”。都是“它”要我写,于是就命笔了;而不是我硬要写“它”,或听“命”而去写“它”。刘锦云还说:我是“沤”在生活里的。这种“沤”,浸入了灵魂,绾成了“心结”。(见刘文:《家在河北》)

回顾我国60年来农村题材的作品,不管是小说、电影还是泛滥成灾的电视剧,有多少都是因为内容浮泛、一般化而很快就被人遗忘;又有多少是因为事过境迁,作品马上就丧失了自身存在的价值而短命夭亡?

这样我们就接触到了一个文艺创作的根本性的命题:只有真正植根于生活的沃土,润化于作者的心灵,作品才能有深度,有魅力,有灵性,也才能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刘锦云的农村题材的作品就是这样。

《狗儿爷涅槃》之后锦云又创作了《阮玲玉》和《风月无边》两部话剧,前者还曾经得了某个大奖。但窃以为,这都并非他之所长。就好像人闲了、闷了,到别人家里串了个门罢了。刘锦云怎么能舍了农村的天地,离开自己常年守望的心灵的家园呢?

果然,今年3月,我在石家庄就又看到了河北省话剧院演出的锦云的新作《日出而作》。

《日出而作》是刘锦云从北京人艺院长位上卸任,重操旧业后所写的三部农村题材话剧中的一部。日前该剧本已经进入文化部舞台精品工程剧本征集的视野。读剧本时,人们就已然能感到它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分量。河北省话的演出,由著名导演查丽芳执导。

就《日出而作》这部戏,我曾和锦云聊过,他自称这个戏“半是对过往生活的回望,半是凭吊”,由于在时间上已经拉开了一段距离,因而类似于老牛反刍,或曰茶客品茶,是回味性的,发过酵的,淡淡的,里面既有苦难,更有温馨,乃至对燕赵大地更美好的未来的企望。

作者对自己作品的阐释,当然是最具权威性的。

诚然,《日出而作》里所呈现的,依然是刘锦云的人生底色和艺术个性。甚至连剧本所使用的台词语言,都依然带着那种特有的,被文化熏过、滤过的草根气息,机智俏皮,富于表现力。另外,浓重的人文关注和悲悯情怀,始终流淌、洋溢在戏的字里行间。对于所有这一切,我都极为推重,赞赏。

除此之外,我觉得《日出而作》与《狗儿爷涅槃》两个戏相比较,又有着一些较大的差异。

《狗》剧不分幕分场,共有15个以事件划分的“节段”,而以狗儿爷一人、一事贯穿到底,是为散文式结构。

而《日》剧分作三幕(早、中、晚),是用散点透视的方法,将三组人物关系和命运,交叉纠葛在一起,形成了近乎“三一律”的结构,用了一天的时间,围绕着饲养棚一个固定的场景,但是作品所覆盖的,却是更为宽广、更为纷繁、复杂的人物和生活事件。

《狗》剧悲喜杂陈,深刻饱满,风格上却空灵飘逸,看起来轻松愉悦。

《日》剧则凝重内敛,撼人心魄,有着强烈的冲击力和穿透力,它迫人思索,让观众看戏时备感沉重。

《日出而作》三组人物中,都包含有一个令人震撼的惨痛故事:

单干户金大翠之所以成为寡妇,愿意嫁给老光棍饲养员陈老炳,是因为她家的母驴怀上了骡驹,单干户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骡驹也便有了资本主义的属性,不准出生,硬给宰了。其夫因心疼牲口坐下了重病,气死了。

富农女儿小梦与地主儿子相好,为避免坏出身的叠加而忍痛分手。小梦嫁了个外地的工人,怀孕难产,几代单传的丈夫要求“保孩子”,小梦于是便香消玉殒断送了性命。为了让襁褓中的孩子有熟人照应,小梦娘家又在小梦死去的当天给女婿续了一门亲,于是“丧事喜事一起办”,白茬棺材改作了红漆板柜。

杜社花老爹重病卧床,下面有比肩6个弟妹嗷嗷待哺,她只能听从母亲的劝告,放弃自己对爱情和生活的憧憬,嫁给烈属朱大妈有病的儿子,以换取一个招工指标,用来挽救全家,免于冻馁。

……

这确实是“头朝下”的日子。

然而,每个从那个“有生产队的日子”里走过来的人,又都不能不承认,这确确实实就是我们几亿农民曾经一天一天挨过来的日子。

所幸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具有着坚毅、乐观的性格,具有着超常的韧性和耐受能力,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所幸的是这一切都终于过去。我们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见到了小岗村的曙光,进而有了今天的经济繁荣和充实国力。

看过戏后人们于沉痛之外,同时更有着一份欣慰和喜悦。

我认为,《日出而作》是一部有思想分量,有艺术水准,敢讲真话,力挺改革的佳作。

在快餐文化、垃圾文化充斥坊间的今天,我们呼唤有更多像《日出而作》这样,于文化建设、世道人心均大有裨益的严肃戏剧问世。

自由心灵的呼唤

——话剧《日出而作》观后随笔

王蕴明

在戏剧这个圈子里,大概很少有人不知道刘锦云的,他已是名副其实的著名剧作家了。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创作的《狗儿爷涅槃》堪称为新时期话剧创作的经典。由于工作的关系,自上世纪70年代始,我们相交已近40载,他由小说《笨人王老大》、《背碑人》到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的话剧《女儿行》、《狗儿爷涅槃》、《阮玲玉》、《风月无边》等,我都看过,有的还为其做过评论,评过奖。锦云出身农民,又在农村工作过一段时间,所以他对农村和农民有着先天的熟悉与感情。锦云修业于大学文科,具有较深厚的文学功底,又极聪明睿智。所以他的作品大都不同凡俗,有自己独到的发现,生活气息浓郁,人物性格鲜活,文理流畅,语言清新本色,读来既发人深思,撩人心弦,又兴味盎然,愉目怡神。可见其理性思维与形象思维已经抵达和谐统一的美学层面,非一般写家可同日而语。

由河北省话剧院演出的《日出而作》,为其近作。记得两年前,他在观看了中国戏剧节的若干剧目之后曾有感而发曰: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果然,一年之后,即钓到了《日作而出》这条大鱼。我先读了剧本,后看了演出,大局一致,略有微调。就题材背景而言,《日出而作》可视为《狗儿爷涅槃》续篇,而人物、情节、题旨则各呈异彩。《狗儿爷涅槃》是采用聚焦的手法,通过狗儿爷这一典型形象集中地折射出新旧中国30年农村的巨大变革和农民性格的双重性,状述了中国一代农民所背负的历史积淀和顺应时代的蜕变与升华。《日出而作》是截取了上世纪70年代初期那个特殊历史岁月的横断面,采用散点透视的手法描绘了中国农村的生态情貌。这里既没有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也没有猥琐下作的角色。他们都是平凡的一般人,在那种非常态的社会环境中,被桎梏着、挣扎着、扭曲着、适应着、生存着。这些五行八作的芸芸众生,各有自己不同的喜怒哀乐和生存情状。然而贫苦的物质生活并未使他们失却生命的信念欲求与达观,社会环境的压抑并未挫去其本原的善良、坚毅和智慧。由此彰显着作家深厚的生活底蕴和对农民命运的真切关爱。

善于塑造性格并选取典型动作以映照性格,在这部作品中再次显示了锦云剧作的一大特色。像解放前为赡养瞎眼老娘以三担玉米自卖自身当了两次8天国民党兵(当了后又伺机逃回),背着“历史问题”的陈老炳,解放后连老婆都娶不上,而作为生产队饲养员对他所饲养的牲口却像孩子似的疼爱,勤勤恳恳,忠于职守;由深山里跑出来的单干户寡妇金大翠,深夜钻到饲养员陈老炳被窝里,分文不要,倒贴50斤粮票(那时一个壮劳力的月定量只有28斤)自嫁自身;在“三年困难”时因饿极夜间偷吃生产队青玉米棒子而被戴上坏分子帽子的赵有常,宁戴坏分子帽子也不愿认错当队长,却“起小就喜欢这庄稼苗。老阳底下,我爱闻它的青气味儿;大黑夜里,爱听它嘎嘎拔节的响声!人要爱上啥,爱得上瘾,谁也没法治,能爱到骨头缝儿里去”;逆来顺受的地主儿子周祥善为了不让青梅竹马的恋人富农女儿小梦“手拉手儿去跳井”,竟然忍痛让小梦嫁给了“粗粗拉拉”的城市职工马可强,为抑制内心的伤痛并砥砺意志每天早晨跑一趟县城来回40里;暗恋着周祥善的贫农女儿杜社花,因家贫秉承母亲旨意为给哥哥杜大社换个招工指标竟“自愿”嫁给烈属朱大娘夜间尿炕(实为性无能)的儿子土改;被公社领导信任的治保主任王玉才却为因贩卖皮袄被公社“打办”干部追踪的崔长利打掩护,又尽力劝说赵有常“认个错”,以便摘去他坏分子的帽子,选举他当生产队队长;娶了周祥善恋人小梦为妻的马可强,在小梦难产之际为保“三代单传”而保子不保母致使小梦惨死。丧事尚未办,即按小梦表姨的意愿“又在他们村续了一门亲,丧事喜事一起办”,原来要做棺材的木料“改做靠屋墙的板柜,要双开门,红油漆的”……剧作中凡是有名有姓的角色,哪怕只是露了一下面,只有几句台词,如配种的焦师傅、劁猪骟牛的吴师傅等,均能给人留下不易忘怀的印记。

显然,这是一部反思的作品,深寓着作家如同以往剧作那样对社会、人生的思考与探索。历史的经验值得关注,正视历史,开创现在,展望未来,是人类的使命,勇者的情怀。向往自由与幸福是人的天性。然而,中国农民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历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数千年来始终没有摆脱悲苦的命运。一千多年前的陶渊明曾为人们描画的“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世外桃源终未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在3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有成功,也有失败,有经验,也有教训,《日出而作》中所描绘的农村场景乃是真实的生活写照。马克思曾经说过:“历史是认真的行动着的,经过许多阶段才能把陈旧的生活方式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它的喜剧。”毫无疑问,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既有悲剧,也有喜剧。因之在戏剧作品中介于悲剧与喜剧之间的悲喜剧占有一个很大的比例。锦云同志可谓是营造悲喜剧的高手,在《日出而作》中有着出色的展现。诙谐的人物性格,幽默的语言,融贯全篇,辉映舞台,是“真正悲剧的同时又是高度喜剧的”(高尔基)。往往在悲情的述说中内蕴着不掩的讽喻,在调侃的对话中难禁无奈的辛酸,艰难困苦中透示着生命的乐观与希望。正如马克思所说:“这是人类能够愉快地同自己的过去诀别。”

河北省话剧院有一支技艺精湛而又十分敬业的演艺队伍,他们的舞台表演真挚、朴实、自然、本色,而又兴味盎然,富蕴美感,观后令人久久难以忘怀。可喜、可贺、可赞。

在《日出而作》的文学剧本中,全剧是这样作结的:众社员在新队长赵有常的指挥下分头下地干活去了,饲养室只剩下陈老炳与金大翠,二人默默对视,金大翠投入陈老炳怀里,陈老炳:(手一指)窗户,金大翠:瞧,早就糊上了……急了吧?陈老炳:都是你勾搭的,你这个单干户……金大翠:来吧,咱这地好种着呢,撒籽见收成……舞台演出本改为陈老炳与金大翠双双回到金大翠的老家——远离公社的深山里做单干户。应知,一千多年前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不曾存在过,在当今社会也不会出现。单干户只是一种阶段性的农民生存方式,随着社会的进步,更高级的生存方式正在和必将出现在农民中间。